

# 官府与民间的离合：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改办学堂的历程<sup>1</sup>

刘熠

**【摘要】**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正处于发展兴盛之期，就面临改革的命运新政初期地方官对此大都观望敷衍，一些场镇还以为官府要倡兴书院随后朝廷从变通书院转向舍弃书院方式，并用划一章程来规制办学。但遵章办事尚未形成习惯，对书院如何改办，地方上仍自有主张，且钦定、奏定章程从名词素语到办学方式几乎是全新事物，一些地方对改办学堂手足无措科举将停罢的消息，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书院改办学堂，但一些地方要待到废科举后才真正认真落实。此后在官府的压力下，学堂更具形式，而民间总试图保留某些书院色彩。到筹备立宪阶段，一些地方甚至请求裁撤由书院改办而来的学堂。清末书院改办学堂，主要因外来标准成为庙堂上“正确”的准绳：这一改革过程，充满官府与民间的分歧，亦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清末俗与制、上与下、新与旧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清末兴学书院改制废科举官府与民间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8—0152—14

书院这一沿袭千年的办学模式，在清末受到全面质疑，并在数年内普遍改办为学堂。既存研究大都站在新教育的立场，对书院改制的原因、意义进行评述，或对书院改办学堂的时间与数量做概略性统计，而较为忽视书院改办学堂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基层书院如何经历变革，如何一步步改为学堂，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外，受教育学视角的影响，论者对书院改革的关注，多集中在师资、课程等方面其实书院不仅关乎教育、学术，还可以说是与传统政治、教化、经济、科举、信仰、民间会社紧密相连的基本建制。对这样一个沿袭千年的制度所做的根本性变革，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加以认识。

四川省存留了丰富的清代基层档案，使进一步了解当时民间的情形成为可能本文拟电新梳理清末四川府州县书院改办学堂的具体历程，侧重基层及守旧方的反应，尝试从文化和社会视角，深化对书院改学这一大变革的认识。

## 一、新政初期的变通书院

清末书院改办学堂，大致始于戊戌变法时期。但这一时期，朝廷的重心似更注重变科举而非兴学堂；川省部分书院改办学堂，也主要是因为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动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兴学的上谕此时书院改办学堂，基本保留了书院的形式，主要通过改课策论、购新书、添聘算学教习来传习西学。

庚子以后朝廷重启变革，首重科举和学堂二端。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十六日朝廷发布上谕：从次年开始，科举加试策论，以“中因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为重。八月初二日上谕：各省府州县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二旨一体两面，均试图引导士子学习政治、史事、艺学，以解决人才问题。

此时朝廷大体上视变科举、兴学堂为一体，更注重前者。川省此时似也更看重科举改革沪七月十六日那份改科举的上谕，随即在四川各州县产生较大反响（详另文）。而八月初二日兴学的上谕，生效就要慢得多。

大约光绪二十七年底，四川总督“通飭各州县多设学堂，并查明县属有书院几处、经费若干、如何改设、如何筹办”二对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末底层兴学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省为考察对象”（13YJC770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 仪巧 sj，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 401120）

此。秀山县知县吴光耀作出了积极响应。他将该县“六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并定章程十条。照常月课”吴光耀的兴学热情，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学问和教化的看重。其所定的学堂章程，多是讲施教之道与治学之法，尤重经学、月课和书法。这与朝廷所重不无距离唯章程中“宜多买书籍”“生童早起须习体操”二条，也颇具新机。书院“如何改设、如何筹办”既由地方察办。可知此时州县官对办学有较大的自主性。吴光耀改办学堂较大地保留了书院的施教方式，相比之下，沈秉堃在泸州办学就采用了新的形式：光绪二十七年他创办了川南经纬学堂，其“规模宗旨，用外间日讲之例”。分设经学、史学、国文、小学、算学、体操、地理、日文等科”一除聘请趋新士人任教，“日文、体操由日人有田正俗担任。

大体上这一时期四川各府州县对办学堂不甚积极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巴县知县在给观文书院山长的聘书上写道，全年束脩“以改设学堂之日为止”，按月致送。该县明知书院改办学堂，却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似乎有意观望；，随后川督奎俊看到，奉旨创立学堂“节经先后通伤遵办在案，迄今数月之久，各属察报开办者甚属寥寥”他径直札饬各州县，警告说：“事关变通学校，法在必行，切勿视为具文，观望延缓；”江在上峰再三札催后，南部县知县察覆说，“现已于卑县凌云书院改并为小学堂，延请熟于算学之蓬州嗽生刘星黎专为教习”。“囑令在堂生童，于讲读经史之外，即从肄地輿算术等学：每月于经史正课之外，添考輿算各学一次，另奖膏火”。现“已购輿算各书二十余种，俾学习生童有所研究一俟年岁稍丰，添筹经费。再行渐次扩充”。

该县改办学堂的方法，在于聘师、购书、改月课数端。与戊戌时期的做法一脉相承：这份察文由礼房起草，房书原稿仅谓于书院“添设算学馆”，生童随刘星黎肄习“算学”；知县改为于书院“改并为小学堂”，随师肄习“地輿算术等学”二可知房书理解的兴学，即书院添一算学馆、添习算学之谓，其观念大致还停留在洋务运动时期而知县作这样的删改。更多是壮纸上的观瞻该县的实际操作恰如房书所云。此外。该县称已将凌云书院改为小学堂，实则书院并未改办，而是在五显庙另立一堂，且大约半月后才开堂二生其仓促应付之情可以想见。

禀上，保宁府批：“仰即督伤教习认真将事，勿托空言，律期人才蔚起，是所殷盼。”学宪吴庆坻批，所察筹办情形“自系暂时试办，将来奉到京师大学堂颁定条规、课程。仍望遵旨切实办理为是”。吴庆坻敏锐地洞悉了朝廷的动态二朝廷对兴学原初的意思，重在制定学堂学生的选举鼓励章程；、此时在一些趋新大员的推动下，逐渐转向划一学堂的课程。而吴庆坻本人，即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他不久前刚上一折，力陈“兴设学堂，以定立课程为要义。定立课程，以各省一律为要义”。而保宁府正堂的批文，更多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态。他此时正负责将府1锦屏书院改办中学堂，所拟章程主要包括：

一，现请院长附贡生王扩品端学裕、士论素孚。暂令督课经史及政治等学。侯筹有经费，再行访延中西教习

一，向来官课、师课一律改以经义策论命题。

一，监院、斋长暂仍照旧，侯经费扩充时再行酌改：

一，需用经费拟择所急，约计用数，体察各属出产丰细，酌定数目多寡，分仿九州县因地因时察酌制宜筹解备用：侯有成数。再行另议扩充章程案请核定立案。

这位知府大致知道改办学堂需分科聘请教习并改变职司人员的设置，但在这些实质性问题上多称“侯有经费”再行更易。他重视的是山长“督课经史及政治等学”及考课“一律改以经义策论命题”，这都可见明显的科举导向性。

禀上，川督一语中的：“学堂为当务之急，全赖地方官认真举办：该府既未妥定章程，又未筹定经费，仅改书院之名，于学校有何实际？”他警告该府，须“实力奉行，毋再敷衍塞责，是为至要”有意思的是，遭此严谴，保宁府知府竟然把原察连同批文一起抄发下属州县：他只是让下属阅看，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如如实改办书院，或者派款各属）。这一举动值得玩味。他在原察中说，该府“近年屡遭荒歉，兼之征捐迭次”，筹款不易，“惟有因时因地斟酌制宜”办学被逼无奈，而又不肯扰累百姓

---

和下属州县的苦衷，已是呼之即出：筹款不易也可能是巧于卸责的借口。光绪二十八年，有人观察到，川中各地对办学堂“或谓经费难筹，巧于卸责；或更私相说议、阳奉阴违官吏遂其偷漏之情，绅民扭于便安之习，泄泄沓沓，视若固常”。

各地对办学“私相说议、阳奉阴违”的情形颇值得注意，此前兴学本是官府和民间都十分重视的事，此时朝廷兴学却面临着民间或地方的离心趋向而地方士人的态度，是此时川省对改办学堂普遍不积极的部分原因。

南部县士人对书院改学堂就自有看法：光绪二十八年，该县凌云书院山长冯云山辞聘知县张景旭急忙与县中生员商议另聘生员们对冯氏此举颇为不然：“生等闻除算学外别无所长，何遽身价自高现在考试仍用经文论策，并非一算学外无所事事”他们提及，“南邑未变法以前，因凌云书院历来山长专学制艺，不讲经古词章，是以另设经古书院，延请拔贡刘坑主讲该拔贡向在尊经书院肄业”，其教读“与变法宗尚之意相合”他们察请“将经古书院与凌云书院并作一院，即请该拔贡主讲，以植中学之基”至于西学，来岁或可续聘刘星黎教习算学，“或算学暂可从缓，俟巨款集成再访兼通中西学术之人”。从这些生员的言辞中，可知他们眼中的“变法”，是书院由专学制艺转向注重经古词章，尤其看重尊经书院的影响，相比之下，算学倒是“暂可从缓”这一趋重经学的取向，是清末川省的独特学风，与朝廷变法趋向不无距离。

知县同意“合延二刘山长为一堂，分教经史、算学”。但认为“算学一事，系西学中必不可少，又系奉文举办之件”他强调，凌云书院需“遵奉通伤改为南部县小学堂”，并令斋长速“将匾额另换一面，公议章程数条，呈候核明通察立案”。

就在这时，南部县收到了新任川督岑春煊的径札，限期一月，令各属清查已办未办各学堂情形此次清查的内容细致而广泛，包括书院旧有及新筹款项，堂中章程若何，堂内教习、学生、管理员的人数、姓名及薪资等而清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各书院、学堂，还包括城乡义学、蒙学。南部县接札后不免仓皇：该县书院匾额未换、章程未定又值山长辞聘，知县赶紧札饰书院斋长“迅速将书院义学各项，遵照单开各款逐一详细查明一面妥议章程数条，于本月内一并察覆，听候核明通察”。

巴县接札后也感形式急迫，但与南部县重在书院改革不同，知县瞿勤炜认为川督意在“多设蒙养学堂”他札伤各场详细清查各地书院、义学经费。巴县各场里正、监正接札后反应不一，一些人认为县官是要倡兴书院、义学：如麻柳场里正特地解释说，本场“向无书院义学”，“去岁正等协议，停会欲兴义学，奈出款细微，拟俟集腋成裘再行设馆延师，以致现未兴设”他们之所以如此理解，主要因为巴县各场镇文教有其自主发展的轨迹此时巴县约 80 余场镇，已有 10 多个场镇先后设立书院，另有 10 余场设有义学。其余未立书院的场镇大都希望设立书院，未立义学的场镇亦思募资兴立义学。可知，虽届新学肇兴的时代，巴县不少场镇仍在旧轨道上运行，陆续筹兴义学、书院。

除了一些人把知县清查款项的伤令理解为倡兴书院义学，也有少数人颇识时务如丰盛场蔚起书院“改名蒙学堂。田租七！•余石，延师四人课讲”。山实则该书院才经乡绅募建不久，“初落成，尚未延聘院长，至二十七年乃改办学校”月

## 二、用划一章程改办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钦定学堂章程出台，意味着朝廷否定厂此前以书院为代表的办学模式切次年初，省城改书院为高等学堂之举顿然中辍：岑春煊奏请缓办高等学堂，先由总理“胡峻带同华教习数人前往东洋考察各项学校，像一切管理教授之法均可了然于心”。回川后开堂“或较今日稍有把握”。办学突然成了一件不太有把握的事情，且需要向东洋取经，注重“管理教授之法”。是钦定学堂章程带来的直接改变。

光绪二十八年底，钦定学堂章程经川省翻刻后札发各府州县岑春煊在札文中强调，各地方官“务须伏读终篇，切实照章办理，毋得发房了事其各学堂之业已办成者，自奉到此次所发章程，即将从前原拟章程一律作废”如有万难全遵，仍准参酌变通，“惟学级、学科则不得妄行更改”。这意味着，各地自主的力、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画上句号二岑春煊对“伏读终篇”“毋得发房了事”的强调，也揭示出遵章办事尚未形成习惯，民间未必看重钦定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年初，南部县大概合并了经古、凌云两书院及算学学堂，换上小学堂的匾额，招考学生开堂了一处该县随即拟定了“南部县小学堂堂规”这份堂规有不少钦定小学堂章程的痕迹，如告假、肄业年限等条款，又如设立总理、收支、文案等职司人员，看来是细致阅读钦章后所订。但又与钦定小学堂章程有明显的裂痕：堂规没有采用钦定章程规定的分科授课，只云“学生功课以上半日学习西学算法，以下半日温习经史”，也没有采用分班、分级的办法，未限制学生年龄，未放暑假，未采用计分考试法，也没有规定建置器械室、标本室、教习室、职员室、操场、自修室、食堂、浴室、养病所等处所，亦未打算备置师生姓名履历、督课、考试等表簿，

在实际操作中，南部县基本贯彻了上述“堂规”把书院山长、斋长、看司分别改名为总理、收支、打扫夫，并增设文案一名以管理图书：堂中仅聘有“中教习”“西教习”各一名在学堂器具上，购买了地球及时钟等，并买了一些新学书籍，但似未购置钦章规定的各种图式、黑板、标本模型及体操器械。值得注意的是，钦定小学堂章程对时人重视的考课、膏火只字未提该堂此年停止了月课，但仍照旧发给生童膏火。似：可以说此时南部县仅在堂规、舍规、职员名称等方面较为遵从钦章，而在分科授课、分级分班、限制年龄、生童膏火、学堂建置等关键性问题上几乎与钦章背道而驰这些不同之处，尤耐人寻味。

随后，南部县将办理情形上报，并附呈所订“堂规”，随即遭到川督及学务处的严厉驳诘：

学务处案早，办学堂总须恪守钦定章程，方不素越该县既云伏读终篇矣。遵照颁发学科、学级矣，何以未将所办之学究系寻常小学堂抑系高等、寻常两小学并办详细注明？教习姓名亦未分别具报。学生之班次以阶级高下为班次，该县以膏火有无分之是所谓伏读、所谓遵照皆欺饰之语！仰即另将章程从新读过，学堂从新办过！倘犹凌跟紊乱，纵不虑误学生之升班出身，独不虑查学者考究乎！慎之慎之！仍将所办情形详细票视，并录报该管司查照。

该县对钦章确曾“伏读终篇”，只不过自有看法和取舍。清代地方治理本给州县官预留了较大的自主空间，对南部县而言，如此办理被指为“凌躐紊乱”而遭致严谴，大概有此出乎预料这从反面说明了钦定章程及川省学务处的不同寻常。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科举尚存，对基层官绅民而言，对书院作学级、学科等形式上的变革，大概没有太大必要

在具体的教学上，此年南部县小学堂仍沿袭了书院的做法，以定期考课、每日作札记为主，其目的大致仍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该堂“月有六课”，每课作“策论”一篇；教习刘流对“每日功课七八十本，一一过目”，“夜间抽签为学生讲说”；该县遵命上呈教习刘流著述。岑春煊批示说，“其示门下士经古杂作诸法门，仍系往日帖括之语，诗文尤属肤廓”，“今日教育重任，断非所胜”，“仰即另行延访敦品励学之士，毋得瞻徇情面，颺打吴生徒”公

刘沉随即具察，“自惭旧学不符新章，特恳另聘通材。善育多士”知县批：“如察辞退。”但刘沉本是县人器重的尊经院生，对其被逐，该堂生童颇不甘心。他们联名请求知县慰留。“以安多上之心、从众人之望，庶不至人心涣散。另欲改图”最后一语，已近挟制。知县批：辞退刘沉系奉总督之命，“该具察等人堂将及一月。称谓尚不了然。其他可想！况称为教习系奉谕旨更改，现察仍称刘山长，已有不是。再小学堂系生童出身之始基，尔等果欲另图。何妨及早，以便另选补充；如拖延日久，则学堂膏火尚应照章赔出也”。教习的去留，预示着书院不同的办理方向，在这一问题上的官绅分歧，已经到了情绪失控的地步。

光绪二十九年。巴县官方也真正着手将官办的字水书院改为“小学堂”台在县官考课与学堂考试之间，该县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学堂仍旧每月一考。惟不再由知县命题扁试，改由“各教习考核送阅”，再由知县“按月出榜晓谕”至于与考课相关的膏浆，此年则被停支。该县长生场士人也观察到“近因书院改为学堂，城乡均已停课。

此年南部县仅停留在城中书院的改办上，巴县却在知县的督导下，开始将场镇的书院改为学堂：如二圣场里正们称：“今已将文明书院改设公立小学堂一席，束脩谷不十石，从学者以二十名上下为准。分设蒙学堂两席，每席馆谷十五石，从学者以廿为准。”这样的“改设”看来颇为容易实则该场文明书院几年前就察请改为蒙馆当时的情形是，“近年时事多艰，乡里读书渐少”，该院“纵延有名师。从学者究属寥寥”，馆谷虚糜可惜遂“将馆谷六十石分作三馆，以三十石谷延一师作为经馆；外设两蒙馆，

---

每馆给谷十五石”了叮摆诸几年前的察文，可知后来所谓“改设”大概就是“改名”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一些书院改办学堂，并非仅仅因为官府的法令。二圣场书院几年前就出现了读书渐少、从学寥寥的情形：长生场的毛益书院似也有类似经历，首人们提及该书院近年“停讲数载，富有积费”。这些现象表明，兴学之前一些书院本已面临着危机，但这一危机或不在于后人评述的书院弊端，妙而在于“时事多艰”。这大概是一些书院或主动或被动改办学堂的一个隐衷。

对于书院该如何改办学堂，地方士人也自有主张：长生场士绅就作了因地制宜的变通经管该场三益书院膏火的绅董们说，此款自应改为公立蒙学，“奈四乡穹远，贫苦肄业者多限于地，难于卒业”二他们采取的办法是，考取“蒙学三十名，专送本场十五保内贫寒子弟”，“按名给送束脩银帖，并发颁定蒙学章程一本。自行附近择师”，“三节解馆考校一次，定学生之优劣，即以分教习之勤惰”至于三益书院的束脩，则不打算用于改办学堂，盖“前辈议定陈规，凡本场有叨乡荐者，延聘一年”。

长生场三益书院的膏火、束脩，由不同的首士经管，并有各自的会规他们的办学，大体是在坚持旧规的前提下，把部分书院经费改办学堂。分送学生束脩、自行择师，其实是该县义学的一种办理方式，而三节各考校一次，仍沿袭了考课的形式：为地方新取得功名者致送束脩（实际上是一种奖资，当地称为“干脩”），也是较常见的做法一但知县认为该场“不必化公立者为私立，徒供贫寒束脩”，唯有遵照钦定章程改办学堂，才能“由本县通报省城高等学堂暨各宪查考，为学生毕业升送之地”一至于三益书院束脩一款，“以书院束脩作人情，乃向来积弊，现在学堂教习必须实能在堂训课者方可延聘”。“岂能以有用之款，徒供干脩虚糜”？总之，“该场旧规应即改去，不准照行”长生场绅董关心的是四乡就学的便利以及对贫苦子弟的抚恤，而知县虑及的是学生的出身：这在此前并不矛盾的事，竟因兴学而截然对立。观念转变后的知县，再看地方书院旧规，颇觉“可惜”“虚糜”。

光绪二十九年年底，锡良开始督川：奋以日本国民教育模式为“正确”的标准，锡良极大地否定了传统的办学模式：他认为川省此前办学大都“徒有虚名，毫无实际”具体有只难，“一曰尤东总理不得正绅，检查并无专责，则管理学校无人也。二曰无师，山长可充教习，拿陋不堪师范，则教授学生无法也：只日无费。经费极不易筹，而膏火一项岁糜甚巨。勉兴一学已为竭力，谋及四乡蒙童则更不逮也”所谓“无东”“无师”“无费”，等于在管理、教学、经费支出方式上，把传统书院的办学模式否定了。用方旭的话说，他们是“不忍以书院乡学之略为变通者欺世而塞责”。

光绪二十九年年底，锡良开始督川：奋以日本国民教育模式为“正确”的标准，锡良极大地否定了传统的办学模式：他认为川省此前办学大都“徒有虚名，毫无实际”具体有只难，“一曰尤东总理不得正绅，检查并无专责，则管理学校无人也。二曰无师，山长可充教习，竟陋不堪师范，则教授学生无法也：只日无费。经费极不易筹，而膏火一项岁糜甚巨。勉兴一学已为竭力，谋及四乡蒙童则更不逮也”所谓“无东”“无师”“无费”，等于在管理、教学、经费支出方式上，把传统书院的办学模式否定了二’用方旭的话说，他们是“不忍以书院乡学之略为变通者欺世而塞责”。

尽管如此，此时基层仍有自行其是的空间光绪三十年（1904），南部县小学堂不仅没有更臻完备，反而缩水：一年前，刘坑被逐，县中聘请举人汪麟洲担任“中学”教习：这年堂中进而裁去了算学教习，仅留汪麟洲一人教授：至于学堂房舍，亦因循书院旧址。知县称尽管“斋舍无多，又不合式”，因天灾无法募捐改修当知县王廷赞把办理情形上详后，又引来锡良的驳诘：“该县平日漫无头绪，据今来察教习只一汪麟洲，而总理、副办腴如也，章程规则、科级功课更腴如也，但就形式上论。缺点正多矣：如此而谓之办成，曾与书院何异？”在锡良眼中，“书院”已成为负面的坐标，学堂“办成”首先要“形式”上与其区隔。

相比之下，此年巴县由字水书院改办的小学堂渐具形式：堂内学生分为“高等级”“寻常等级”两级除知县考课外，堂内亦开始分科考试。毋堂中至少分别聘有经学、史学、算学、英文教习。堂内还遵章设立了礼堂、特别讲堂、通常讲堂、图书室、标本室、职员室、教室、屋内操场、食堂、浴室、学生寝室（即各斋房），但也保留了原来书院中的文昌殿、会客厅、轿厅、仆役室，并把大成殿改为礼堂落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书院大都有的大成殿、文昌殿，竟然不在钦定、奏定章程中’此外，巴

县小学堂还购买了诸多理化器具、体操器械、图示标本及各种西学新书：此年该堂还遵照上峰伤令，将学生“火食一律停止”。但上年裁去的膏奖、月课，这年得以变相恢复：由知县“每季考试一次，按照平日之积分以定奖资，不仅凭一日之短长：有此津贴庶足以培寒峻向学之心”

光绪二十年下半年开始，川省各府州县陆续收到了朝廷新颁的《奏定学堂章程》。随后，南部县在呈报的“小学堂调查表”上登载：学生两班，八十人；管理员有监督、监学、收支、文案；学科分“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教员仅汪麟洲一人。二该堂学科虽遵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惟堂中各科一人恐难胜任，故所列学科显有不实之处而“监督”“监学”“文案”又系中学堂规制二锡良批斥说：“所填此项表式错误多端，可见该令于学务实未留心，不过空言搪塞！”

自南部县改书院为学堂以来，土峰类似“空言搪塞”的指责已有数次，这固然表明地方对办学的被动，但钦定、奏定章程的出台，也客观上增加了改办学堂的难度对各州县官绅而言，章程不仅充满了外来的新名词，二且其规制大都是既存经验之外的新事物，遵章办学成了很大的问题：例如，新式学堂与旧日书院的一大不同，就是增加了各种“管理员”堂内校长，旧章称总理、副办，新章称堂长、监督；堂内职员，旧章有文案、收支，新章有庶务、监学、会计、司事二这些称谓大都是外来的新名词，其来华后的含义当时尚未定型。五这些新旧意涵不同的外来名词，给不少州县官绅带来困扰，屡受上峰斥责。

章程所定的各种职司人员，不仅是名相的问题，更是对既存办学方式的挑战照奏定章程，校长（堂长或监督）统理一校学务，收支为其靡下一员；而传统的办学方式，书院山长专任讲习，居清贵之位，经费收支等事务则由绅董或杂役负责：直到宣统元年，川督赵尔翼仍看到：“学堂之设监督，原以期事权之统一”。“惟川省学堂习惯，往往于重要事件，仅由庶务长处理。而监督反不过问”——堂之长仍不过问堂内杂务，充分显示了传统的生命力；但在接受了舶来“管理”“事权”观念的赵尔翼看来，这是“放弃职权，自蹈尸位之咎”，“于学务有碍”。一

奏定章程出台后，大部分地方官绅都不知道新式学堂该如何办：其解决之道是出外参观仿办，或依赖留日学生。光绪三十年，重庆士人观察到，府属州县开办学堂者“均纷纷来渝调查，访聘教员”址南部县士绅李雨苍也观察到，“省城为学务总汇，各县多有来省学习办理之法者”山这一年，南部县派出举人汪麟洲往省城高等学堂“参考教授管理规则”，“像资回籍仿照办理”；“·因教授管理无人”，又咨送县人张作询留学东洋，

具体而言，学堂如何建造都成问题章程虽有学堂屋场设置专章，但只是罗列了礼堂、讲堂、贮藏室、器具室、标本室、教员室、体操场等名称，因未见学堂实景，时人多难以索解为此学务处专门准备了“小学堂图及建筑说一书”，令各属“·专案请领”。5又通飭各属选送办学绅士到省城高等学堂参观考察：“

保宁府书院改建中学堂的经历，最可见地方官绅对学堂建造的惶惑不安二光绪只十年底，该府拟动工建中学堂，“因地方绅众金称本年方向不宜动修”，知府以“事关札属士子肄业之所，绅众既拘执俗见为言，惟有缓至来年春定期兴工”但又恐不能如法，遂邮寄信件到省，“询及省城、叙州等处中学堂建造规式”或因“不见学堂照片”，又派士绅“携同工匠一名，亲赴省城切实考求学堂建置形式及应备图书校具等类”。次年四月兴工，“查校地本系书院旧址，中凿有池，周围有壕，是以开工后先令堵塞水口、填平坑陷，开拓添修始能联为一气”但官绅对学堂构造仍无把握，士绅们“屡请不必急从将事”，“拟挨东游各生遗归再行参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底，留日速成师范生回郡，经其亲往校地察勘，“修法已定”，“已无疑虑”，才加速修建自修室、礼堂、讲堂、教员等室。此番建造经历，虽不免“借端推宕之辞”，也确有“惟恐修不合法”的苦恼锡良批驳说，“修改学堂尚犹拘泥方向，种种陋习已为可怪”；至侯东游学生回郡主持，“地方情形不同，修造校舍势难尽仿日本之制”他不禁慨叹道：“该府为表率所在，何至一无主张！”

在堂中的器具、书籍方面，保宁府也极大地依赖留日速成师范生。知府先托留学生详细调查学堂需用的图书、器具，并开回价目清单他还把这份清单抄送南部县，令其速备银两汇交该县留学生，“俾于毕业返川时即行携带回县，以应学堂之用”，“倘

失此机会，以后购置必更为难”。随后，保定府联合闾中县，拨银 700 两。交留日学生在东洋选购学堂器具：

这一情形川省各属多有所见。光绪三十一年底的重庆海关，见证了各州县留日师范生归来时箱篁载道的情景这些留学生受本籍官府之托，从东洋购回了大量的图书仪器因其“箱篁太多”，重庆关税务司不允免税，屡屡与留日学生发生轆轳。最后经川东道与税务司商定，“如系地方学堂官用之物托学生购回者，由各该地方官先行察报立案，准其免税”。

无论是出外参观仿办还是依赖留日学生，都体现出眼光一致向外，表明在较大程度上传统的办学方式不再是有用的资源。

### 三、废科举后书院色彩的抹除

光绪二十九年，与奏定学堂章程同时奏准的，还有《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朝廷拟递减乡会试取

额，并在十年只科之后停罢科举；光緒三十年前府州县书院加紧改办学堂，即与此有关。这年锡良观察到，“迩来各属知科举将停，始皆有急于办学之意”。

但一些地方仍存观望。真正认真改办学堂，还是要等到科举废除后：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朝廷提前停罢科举这年底，南部县知县意识到“高等小学堂亟应分科教授”，遂聘请多人，担任次年修身、历史、教育、图画、体操、讲经、文学、地理、格致科教员。堂中亦设乡土志编撰员、监学、文案、收支、司事、门役、杂役、稽查、司阁等职司人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留日师范生张作珣归来，取代教官出任高小校长；而此时尚在省城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科学习的周璋，亦被聘为教员。堂中的白鸣钟和白墨，即托周氏从省城购回。

南部县高小此前在较大程度上仍是书院形式，此时认真改办学堂，未必是出于对学堂这一施教方式的认同。恐怕更多是视其为科举的替代品：光緒三十一年底，该县高小招考学生，取额由二十名扩大到两百名，投考者须先期“赴礼房投纳试卷，亲填年貌下代籍贯，并书实保人具结造册”任这一做法，与该堂此前招考不同，倒颇类似科举考试的县试。

此后南部县高等小学堂有了进一步的更张光緒二十三年培修出“教员室、自习室、寝室、会食堂”，添置了黑板、白墨、铃、钟等器具，缝制了学堂“旗帜二道”及学生“制服一百件”翻此年该堂教员自编了修身、讲经、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各科“讲录”，图画、体操两科则使用“教科书”该堂还引入了“两学期及四季时间表”“授业时间表”，并开始“按学期考试”。光緒二十三年，在一位趋新知县的影响下，南部县费钱两千余串，在书院基础七进一步改修高等小学堂，如“讲堂只间先系格门，改作水纹窗棂，尽装玻璃”，“左边垣墙外另造毛房二间”，制“圣牌、万岁牌二座”，“背沙回操场一坪，操场边造石沟一条”。这些改造，与此一此新观念的植入相关，格门改作玻璃窗棂，是为了引入“光线”。另造毛房是为了“卫生”。书院内设立万岁牌似是此前少见的做法，与新的“国家”观念相关。

此年该堂教员人数未变，但新学、旧学教员身价大变：如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科毕业的周憬，任该堂格致、图画、体操教员，光緒二十二年束脩 140 两，光緒三十一年增至 2 如千文；而经学、国文教员的束脩，光緒二十二年为 220 两，光緒二十三年降为 1 印千文；此外，继先前裁去生童膏火之后，此年又开始裁除学生的火食补贴。

最后一点并非特例，废科举后，旧日书院津贴寒上的做法进一步遭到冲击二为推广办学，锡良通伤说，自光緒二十二年正月，高小及以上学堂“新旧各班学生一律照章征费”，初小“亦应令学生出少数之资”-此外，“近准总理学务处咨，各学堂开办之初多有月考奖赏一项，系沿从前书院旧例，当一律裁节，移作推广学额之用”。

巴县士绅随即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对程度较高的学生，有必要免征学费，“以示优异”；且贫寒子弟不少，若征收学费“恐有碍教育普及之意”此时锡良的思想方式已发生改变，认同于舶来的教育普及之法，而忘了此前免征学费、给予奖资，让贫寒

---

子弟均拥有上升性机会。本甚得教育普及之旨。

有不少地方试图保留膏奖、津贴，却屡遭上峰批驳光绪三十二年，有人不禁向学司直陈“复科举、兴月课”，就遭致痛斥。次年，学司指责江津县说，“既不照章征费，复有津贴火食之条，已属格外体恤；乃津贴之外又有奖资，仍无异于糜费”。“若以银钱作奖，又蹈从前书院月课之积习”。在上峰眼中，津贴、膏奖不仅是经费问题，其存在本身就是负面的象征如锡良说“西儒斯密亚丹论幼民学费，以官资膏火为学风不竞之由”。又继任川督赵尔翼进而把教员的节礼、聘金、程仪等指为“虚糜”，“大非文明办法”。

与裁去膏奖相关，一些学堂经历了从考课到试验的转变。光绪三十一年，巴县官立高小仍由知县每季亲临考课，不过改为按“分数”榜示。奖资亦有所减少。光绪下十二、三十三年，季课改为按“学期”由知县考试，未再给奖。光绪三十四年，知县仅象征性地出面榜示学堂年终试验分数，不再亲临考试二一

清代地方官本兼具官、师二重角色，官办书院大都由州县官甄选学生并定期亲临考课，一些州县官甚至参与到具体的施教环节。从考课到考试的转变，淡化了地方官衡文校上的角色，是政治与教化分离的表征对此，一些州县官并不习惯剑州马直刺在州署设立“国学研究所”，召集士子朔望会课，分别次第捐廉给奖，庶几“观风劝学，务尽长官之心”：晋为提倡国文，提学使赵启霖也变相采用了考课的办法他规定，“省城各学堂毕业考试国文，如有杰作，由署司传至署内面试，果其文艺优美，酌给实物奖励”劝

在书院形象负面化后，即使要保存国粹也不能直接采用旧的方式赵启霖于宣统年间倡办了四川存古学堂该堂虽在措辞上强调采用学堂形式，其实暗中不乏沿袭书院办法一如堂中部分保留了月考、季考以及旧日书院的作札记办法，并规定“毕业考试时调齐平日札记一并衡校”。赵启霖创设范景仁、范纯甫、张南轩、魏鹤山四先生祠堂，兼作为存古学堂功，更是直接继承了书院祭祀乡贤的传统。

上述条款在四川存古学堂章程中所占篇幅不多，却引起了基层强烈的反响。如富顺县士人就从倡办存古学堂之举看到了希望赵启霖批驳说：

存古学堂本以保存国粹，非徒为体恤寒峻计也。其规模宏大，现在惟省城可以筹办成立之后，各项学科自当照章试验。岂可标名月课，类往时书院办法，致各属又生误会：本署司前拟俟省城各学堂学生毕业考试国文优美者，传集面试，酌予奖励，此乃特别规定，亦不能一概论也。

这揭示出上峰“存古”的主张，可让士人产生什么样的希冀——这意味着期盼已久的体恤寒士、恢复月课等成为可能。对民间的这些希冀，赵启霖均予以批驳，以免“各属又生误会”，在卸任之前，他才直接说：“所请开办存古小学堂，用意虽善，惟部章无此名目，未便照准”工提学使赵启霖虽较认同“往时书院办法”，却不得不与之划清界限，充分表明新学制已具有何等威势。

在筹备宪政时期，面对办学乏款问题，川省当局采取的一些举措进一步抹去了学堂中的书院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宣统二年赵尔翼的“整理学费”纲要其主要内容包括：（1）裁减教员束脩“此后凡教员薪水，均应以钟点为断”，告假缺席则按钟点扣薪学堂管理员尤当酌敏裁并。“不必多立名目，致同冗滥”（2）裁汰学堂使役相比外洋学堂“每日洒扫等事均学生躬执其役”。“我国学堂有所谓斋夫、号房、杂役种种排场”，“使学生习为养尊而处优、颐指而气使，其虚糜款项者害犹小，其有妨于学生之品行者害更大也。以后此项使役应分别裁汰，每堂只用二三人，以供呼唤照料。期无废事足矣”：（3）征收学费“人谓征收学费与教育之普及有碍，本督部堂则谓欲求教育之真能普及，必先从征收学费办起”。

赵尔翼所针对的，部分是新式学堂承继的书院传统：优给教习薪资、多置使役、免征学费，均与物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

---

其在非物质层面上尊师重道、培植文教的意义。赵尔翼提出的以上气点，充分表明各项经费的物质层面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关乎礼、道的层面已被忽视二随后，这一整理学费纲要经提学使逐一详拟办法，通飭各属遵办，并限十日内具摺’

这些举措落实起来非常困难温江县高小在知县的反复施压上，经数次察覆，才将堂内酒席改为茶点、不再津贴学生课本，并裁去教员两人：其间，校长王运昌颇觉为难，请求辞职二学司说：“教骨各员如有反对要挟者，尽可察请撤换，无取乎畏葸退让也；”而实际上，对于教员兼任学科、裁减教员薪金、裁减学生食费津贴，校长均避而不谈士’安县更是“仅就教员薪资开册呈报，其余概未提及，殊属异常疏漏”’

其他州县大概都感到办理棘手以裁去学生食费为例，虽早经通飭，各属多未遵行。南部县高小一度征收学生食费，结果出现了学生观望退学的情形。后来调整政策，每月由劝学所津贴各生“火食钱八百文”。蓬州担心裁节食费让寒峻堕心；蓬溪县也称“津贴食费已成惯习，骤从裁节，恐碍教育前途”停止津贴尚属不易，遑论征收学费对此德阳县推缓期开办，崇宁县称“风气不甚开通，虑有窒碍情形”，-而万县中学生更是“抗缴学费，公然投函以不入学堂为挟制”。

总体而言，对赵尔翼的整理学费纲要，各州县大都敷衍了事至次年二月，虽限期早过，仍有百余府州县“抗延不理”，并不禀覆。雅州府称，此项公文“被房书搁置遗忘”妙江油县则“奉到通飭搁置经年，及奉严催始续取高小校长一纸覆文，加‘覆查无异’四字转详”，其中当裁各费多未裁减砖。

赵尔翼的整理学费纲要大都依据外国标准，而新任提学使刘嘉深住，更是主动把办学建立在外来教育学理之上刘嘉深办学的重心在“划一教科、整顿教法二端”。但对这些方面的注重，已使他有些疏离于国’情与民心：刘嘉深发现，兴学后“读书成学之人不见增加”，但认为其原因在于“不知教术”，故在全省推广“单级教授法”。他虽看到，此项单级教法与“我国往昔金石丝竹之音并作一堂、诗书易礼之数各习一经同时同教授者亦何以异”，但仍拟在省城设立单级教授传习所，并派留学生赴日取经。此外，他通飭各属说，小学教科书“学生自宜人置一本”，“总以一律用部定教科书为准”，否则“即将该校长教员斥退”并责以罚款：’次年初，西昌礼州镇两等小学堂校长即“命各学生各当买十余两银之教科书，或二十余两”乡人评论说，“吾乡殷实之学生能有几人？知识稍开者又有几人？”校长“此言不亦枉费唇舌耶，何不谅之甚也！”学生“人置一本”教科书颇有困难。但“一律用部定教科书”似乎得以落实。当地士绅看到，小学堂校长“反复不常”，学生“课本钞起又换，换过又钞二日寸一变，使诸生等疲于奔命，听夕不遑，殊可厌也”！

随宪政的推进，虽官府进一步使学堂更具形式，民间·些人却对学堂的意见越来越大永川县拟停办中学以“杜糜费、昭核实”。并提及中学“添修校舍外间颇有烦言”该县大安场学董也说，“我邑中高两学以及各局办学员绅俱不免徒事外观，任意虚糜恩详核各学堂之浮支，力裁各学局之杂派”，以助各乡学堂，则各场甚幸：

类似指控，并不少见达县有文生指“中学堂为虚名”。 “议以县中学堂归并府中学堂”， “又辄谓废高等小学、灭高等小学”，云阳县士绅提中学款项办其他新政，即基于“中学堂虚设糜焚”，彭县士绅徐永恒进而指出，“中学堂开办数年，出何货物”， “中学学生程度比初等差有余，比高等小学犹不足”。 “如不撤销，须提出四五千银补助各初等小学堂”。

这些被指控的学堂大都位于城内，由书院改办而来与废科举前后各地纷纷将书院改办高小及中学相比，此时不少地方都试图裁撤这两类学堂在一个对出路特别看重的时代，这无异于自毁前程这一颇为反常的现象，提示出基层不少人对数年来书院改办学堂的失望。

## 四、结语

不少论者认为，清末书院改办学堂主要是因为书院本身具有种种弊端，而没有注意到外来标准所造成的眼光转变清末书院形象负面化，最终被迫改办为学堂，恐怕主要是因为外来标准成为庙堂上“正确”的准绳。

---

书院改力、学堂的过程几乎依据外来标准，除了课程、师资等方面的变革，设置了新的职司人员以注重“管理”，裁去了学生的膏奖、津贴及教习的节礼、聘金，堂内考试取代了官府考课，礼堂取代了大成殿、文昌宫，划一的章程取代了因地制宜，新的教育学理以及外来的时间、卫生、国家观念也逐渐植入基层。

从地方视角看，这些外来的建制未必适合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就面临改造的命运。基层官绅对书院改办学堂大都被动，改办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上峰的督责与压力，与此前办学主要靠民间自主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废科举前后一些地方对改办学堂较为主动，但这多少夹杂着舍此别无出路的无奈：此后在官府的压力下，学堂更具形式，而民间总试图保留某些书院色彩二到筹备立宪阶段，一些地方甚至请求裁撤由书院改办而来的学堂。

书院改办学堂不仅是教育方式的转变，而与文化、政治等层面的变迁密切相关。州县官逐渐疏离于校士、考课环节，是政治与教化分离的表征对节礼、聘金、膏奖、津贴的裁撤，意味着办学趋重物质层面，关乎礼、道的非物质层面被忽视注重“管理”的外来办法，冲击了敬重师道的传统书院改办初期尚由各地自拟办法，后来必须遵循划一的章程，体现了基层治理方式从较为放任地方自主到加强上级管控的转变。

清末的各项改革，更多是应对外来挑战而非解决内部的问题。工新式学堂被官府寄予了退虏送穷的想象，但改办学堂之后，书院方式在基层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二这一官府与民间的裂痕，夹杂着俗与制、中与西、新与旧的纠缠，是近代改革的一大特征。

（责任编辑：张洪彬）